

## 第 1 章

# 墨子和他的学派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名声与孔子不相上下，他所开创的学派是当时著名的“显学”之一。在生前，墨子就获得过“北方贤圣人”的美誉；死后，其声望也并未稍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和孔子一样的仁人、智者。《庄子·天下》篇总结先秦学术发展史，首先提到的就是墨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也有许多孔墨并称的记载。这些足可看出墨子和他的学派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只是到了西汉中叶，儒学独尊地位确立之后，墨家成了害道的异端而遭禁止，墨子的名字才不再见称于学者或儒生之口。从此，墨家便从思想史的主流中消失了，以至于连墨子的思想渊源、生平事迹、墨家学派形成发展的经过等等也都成了模糊不清的问题。为了对墨子及其学派的形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这里首先依据《墨子》本书及当时的其他一些典籍，给墨家的历史作一简单的概观。

## 第一节 墨子的思想渊源

历史上，关于墨学渊源的說法主要有三種：一種說法認為墨學源於禹；一種說法認為墨學源於清廟之守；最後一種說法則認為墨學是從儒家中分化出來的。

第一種說法的根據在《莊子·天下》篇：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胫無毛，沐甚雨，栉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天下》篇的記載不見於今本《墨子》。五十三篇之中，單獨講禹的極少，倒是稱“堯舜禹湯文武”、“禹湯文武”或“文王”的很多。《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也說：“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這些均說明墨子所讚譽的先王或聖人並不僅限於禹，而是包括堯舜禹湯文武在內的一個聖王系列。把這幾條材料對照起來看，墨子所稱贊的“禹道”和“堯舜道”在精神實質上並無任何差別，只是細節略有不同而已。按照《論六家要旨》的描述，“堯舜道”的真精神顯然在勤儉和節約。而《天下》篇所說的“禹道”，講得更多的是吃苦耐勞、勇於犧牲、熱心救世等品德和精神。這兩個方面，在墨子的思想中，實際上是水乳交融、不可分離的。從墨子對“堯舜道”和“禹道”內容的描述來看，他所推崇的聖

人只不过是他自己理想的一种寄托。换句话说，尧舜也好，禹也好，他们的作用只在于使墨子的主张获得某种神圣的合法性。所以，《庄子·天下》篇的说法并不足以判定墨子思想的确切来源。至多，它只不过说明了墨子曾经受到过传说中的某种远古精神的感召而已。

第二种说法的根据在《汉书·艺文志》：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艺文志》的根本主张在“诸子出于王官”。“诸子出于王官”的意思是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后来随着王纲失统，官失其守，学术因而下移民间。诸子分成各家各派正是学问散在民间之后的事儿。因此，追本溯源，诸子十家都可以上溯到某种王官那里，如“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等等。《艺文志》的这种说法虽然有助于解释官学向私学的转化，但它却过分重视横面的剖判，缺乏发展的眼光，所以根本无法解释诸子百家的演进过程。为了追求整齐划一，它不得不引入许多附会的东西。对此，胡适的批驳相当有力：

此其所言，无一语不谬。墨家贵俭，与茅屋采椽何关？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更俭耶？又何不谓墨家为出于洪荒之世乎？养三老五更，尤不足以尽兼爱。墨家兼爱，本之其所谓“天志”。其意欲兼而爱人，兼而利人，与陋儒之养老异矣。选士大射，岂属清庙之守？其说已为离本。至谓“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则更荒谬矣。墨家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也。墨家非命之说，要在使人知

祸福由于自召，丰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可言？<sup>①</sup>

后来，虽然也有人试图替《汉书·艺文志》辩护，但都不能推倒胡适的批评。所以，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的说法不足以揭示墨家的真实来源。

最后一种说法的根据在《淮南子·要略训》：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纂锸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擯，濡不给挖，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淮南子·要略训》中的后半段话略同于《庄子·天下》篇，说明古本《墨子》中可能确实有许多单独称颂禹道的内容，同时也说明了墨子对大禹与百姓同甘共苦之精神的特别钦佩。但是，《淮南子·要略训》并不因此就认为墨家出于禹，相反，它给出了墨家更近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种说法不见于他书，但由以下几方面来看，似乎相当可靠：第一，鲁是儒家的发源地，墨子生在鲁国，早年极易接受儒学的感染；第二，墨子对儒家的典籍如《诗》、《书》等记诵娴熟，达到了可以随口征引的程度；第三，墨子对儒家的一套主张非常熟悉，他自己的理论与儒家处处相反，似是有意立异的结果；第四，儒墨两家有着共同的理想人格，尧舜禹汤文武成了他们共同推崇的圣贤。联系到《淮南子·主术训》“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

<sup>①</sup>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第 594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论”的说法，可以相信，即便墨子并未真的受过“孔子之术”，那也不能否认，儒墨两家有着共同或相近的思想来源。《吕氏春秋·当染》篇曾记载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史角是周朝的史官，对周礼比较熟悉，墨子曾学于史角后人，他自然免不了浸润于周礼之中。鲁国也素有重视保存周礼的传统，儒家便是在这种深厚的礼乐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孔子一生念念不忘的便是恢复周礼以重振社会秩序。所以，习礼、习六艺恐怕是孔墨两人早年的共同经历。只不过，在对待周礼的态度上，他们后来各自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而已，其中，墨子的态度正如《淮南子·要略训》所说：“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关于“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需要作点解释。其实，按照《墨子》本书，墨子并不非文王和武王，也不非制礼作乐的周公。《公孟》和《贵义》等篇甚至还多次提到“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故周公旦佐相天子”等等。所以，似乎没有理由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但事实上，墨子的主张的确与周礼相悖，他对儒家的批评实际上也正是对周礼的抨击。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墨子所“背”的“周道”是实际的、在他生活的时代还依然存在的周道，所“用”的“夏政”只是他自己寄托在古代圣贤名下的夏政。其结果，同一个周公，本来是周道的始作俑者，名义上却又成了专门用来印证墨子本人主张的“天下大圣”。

总之，《淮南子·要略训》篇既为我们回顾了墨子思想的远因，那就是上古传说中的大禹精神的感召；又为我们揭示了墨子思想形成的近因，从而把墨子的成长展示在一个由浸润六艺、出入孔门到自创学派的过程之中；同时还突出了墨子本人的原创性贡献，

指出墨学是由于墨子不满儒家礼教繁奢之后所创立的。这些对我们正确认识墨子的思想来源和理论贡献都极具启发意义。

## 第二节 墨子的生平事迹

司马迁作《史记》，对先秦诸子多所论列，如孔子有《世家》，老、庄、申、韩、孟轲、荀卿甚至仲尼弟子均有《列传》，唯独没有给墨子单独作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作了一个附注：“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对司马迁的这种做法，曾有过多种解释：一种推测是司马迁钟情的是黄老道家，对墨子不感兴趣；另一种推测是司马迁本有《墨子列传》，只是被后来崇儒的人删掉了；最后一种推测则是，当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家早已衰微，留传下来的材料极度贫乏，使太史公无法为墨子单独立传。但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其直接后果都是使我们失去了了解墨子及其学派的最可靠的历史依据，后来对墨子生平的讨论总是免不了带有猜测推想的成分。这在墨学研究中，实在是一桩无可奈何的事儿。

### 一、姓名、里籍和年代

墨子姓墨，名翟，古来并无疑辞。只是到了元朝，伊世珍作《瑯环记》，里面引述《贾子说林》的话，认为墨子的真实姓氏是翟，名字则为乌。之所以叫作乌，是因为在墨子出生时，其母亲曾梦见赤乌飞入室中。清代的学者周亮工接受了这种说法：“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他并且反问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耳？”

按照孙诒让的考证，古代并无《贾子说林》一书，《瑯环记》

的说法大概是伊世珍自己所杜撰的。由于《瑯环记》属笔记小说类，里面的说法自然不足为训。周亮工不加分辨地接受它，有失学者治学的严肃性。他所提出的“以墨为道”更是引发了此后数十年的争端。

的确，在学派取名的方式上，墨家与众不同。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杂家、纵横家等等都是以其学术宗旨来命名的，惟有墨家是以其创始人之姓来命名。这极易给人造成一种联想，好像“墨”也是一种学术宗旨的标志。近代以来的许多学者如江璩、钱穆以及冯友兰都有这样的怀疑。江璩说，所谓“墨”大概是垢面囚首、面目黧墨的意思，墨子之学适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家。<sup>①</sup>钱穆则进一步推演说，“墨”为古代的刑名之一，转辞为刑徒、奴隶，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所以就被称为墨了。<sup>②</sup>早期冯友兰也认为：“墨子所主张者为‘贱人之所为’，此其所以见称为墨道也。”<sup>③</sup>

不过，这几位学者均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先秦各家各派的名称实际上是由汉人来命名的。秦汉以前，诸子的名称大都还没有确定，直到司马谈和刘歆总结过去学术、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时，六家九流的说法才最后成立。正如英国汉学家迈克尔·罗维提醒我们的：“有些人将道家、儒家或法家等名称随意滥用于这些分类尚不适用的时期，这种做法常把中国早期学术史扰得混乱不堪。的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已经出现了这些名称，但在当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某几位思想家截然地归入司马谈所说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或名家之中”。“汉代思

江璩：《读子卮言》卷二。

钱穆：《墨子》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第110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想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刘向、刘歆的总校群书。他们将学术派别作了细密的划分，其实未必恰当。因为它的本义并不是对中国哲学进行分析，而是皇家书库里负责文献收集和整理的官员部勒群书的产物。”按照罗维的意见，司马谈和刘歆的分类工作只是一种方便施設，并不能和先秦学术史完全相应，那么再从这些分类的名称中进一步挖掘更深更玄的意义，似乎更难逃脱捕风捉影的嫌疑了。其实，对于取名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人们究竟是用学术宗旨还是用创始人姓氏来称呼历史上的某家某派，实无一定的标准，正不必泥古不化。就墨家而言，司马谈之所以特别用墨子之姓来作为学派的名称，很可能与该学派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有关，那就是所有的成员都叫作“墨者”。这一点只不过表明墨家这个团体内部的组织关系比较严格，其师徒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依附关系而已。相比之下，其他各家成员内部之间的关系就松散多了，这也许是它们只能以学术宗旨命名的原因所在。

对于墨子的姓氏，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有过一个考辨。他指出：“近人以墨姓不多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顾氏的论证颇多曲折，大意是宋国公子目夷的后人，始以目夷为姓，而目夷又可作“墨夷”、“墨台”（“台”读作“怡”），省掉后一个字即为“墨”，这大概是墨姓的来历。又墨子的主张与宋人的思想颇多相合之处，这似乎也有助于说明墨子与宋国公族在精神上有某种继承关系。由于顾氏的根据主要在《元和姓纂》等内容不十分可靠的著作，所以他的推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尚属疑问。但不管怎么说，顾氏承认墨为姓氏之称有助于纠正江瑛等人的模糊影响之论。

关于墨子的出生地，历史上也有几种说法：有说是宋国的，有说是楚国的，也有说是鲁国的。三种说法均没有确凿的证据，比

较而言，墨子鲁人说的可能性为最大。

说墨子为宋人，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史记》记载墨子为宋大夫，一是墨子为宋国公子目夷之后。墨子是否为宋国公子目夷之后，因为纯系猜测之辞，实在不敢妄断。而从《史记》的记载也并不能证明墨子就是宋国人，因为战国时期，交往频繁，士无定主，在一国做官的并不必然是本国人。像吴起，本来是卫国人，后来却到魏国、楚国做了高官。又如商鞅，本来也是卫国人，后来却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所以，即使《史记》的记载属实，墨子确实做过宋国的大夫，那也不能推断他就是宋国人。相反，从《墨子》中，我们倒可以发现两条墨子宋人说的反例：“子墨子仕曹公子于宋，三年而返”（《鲁问》）；“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公输》）。既曰“仕曹公子宋，三年而返”，又曰“归，过宋”，看来，墨子确实不是宋国人。

说墨子为楚国人的，根据更为单薄。《墨子》中记载有与楚鲁阳文君相问答，清代一些学者就据此推测说墨子为鲁阳人。但观《贵义》篇，有“子墨子南游于楚”的说法，余知古《渚宫旧事》亦载鲁阳文君的话说“墨子，北方贤圣人”。若墨子果为楚国人，这些话都成了不通之论。

倒是说墨子为鲁国人，可以举出许多比较可靠的证据：

首先，鲁国为墨子活动的中心。《贵义》篇云：“子墨子自鲁即齐。”又云：“子墨子南游使卫。”《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也说：“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这些材料均可证明鲁为墨家的大本营。

其次，墨子是在鲁国接受的教育。《吕氏春秋·当染》篇记载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最后，墨子所交接之人多为鲁人。公输般不必论矣，其他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鲁之南鄙人吴虑曾和墨子辩论等，鲁君也曾多次向墨子请教过。而且，墨子和儒者的冲突恐怕也大都发生在儒家盛行的鲁国境内。子夏之徒、公孟子的国籍虽然无法确定，但自称爱鲁人更甚于爱邹人的巫马子则确实实为鲁国人。《淮南子·汜论训》说：“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正可说明儒墨的发源地同在邹鲁。

除了姓氏、里籍之外，墨子的生卒年代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此问题早在西汉时期已经不很清楚，太史公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以怀疑的口气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班固也只是笼统地说在孔子之后。由于年代问题关系到墨家兴起的思想和文化背景，所以近代以来的治墨者都想找出墨子生卒的确切年限。

较早给出墨子生卒年代的人是毕沅。毕称：“翟实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其根据在《非攻中》篇“中山诸国，其所以亡”一语，但孙诒让已证“中山诸国”四字为后人所篡改，因此，毕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稍后，汪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根据孙诒让的考证，墨子之仕宋决不可能出现在景公之世，因为景公之死距齐太公田和执政有八十三年之久，而墨子晚年又曾经亲自和齐太公田和见过面。前后算起来，墨子必须活到一百多岁才可能在景公的时候仕宋。所以，汪中的推测显然失之太前。

孙诒让自己也有一个考证：

窃以今五十三篇推校之：墨子前及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与齐康公兴乐，楚吴起之死，上距孔子之卒，几及百年，则墨子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

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按公历计，周定王元年为公元前 468 年，周安王卒年为公元前 375 年。孙诒让认为，墨子的生卒年限不出这 93 年之间。可是，孙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胡适根据《吕氏春秋·上德》篇早已指出，墨子决不及见吴起之死（公元前 381 年），因为此时的巨子已为孟胜，墨者已有了新立的领袖。孟胜的弟子曾劝孟胜不要为阳城君而死，说“绝墨者于世，不可”。这只有墨子死后才有人敢说这话。所以，孙诒让把墨子的卒年定在公元前 375 年前后，又失之太后。孙氏之后，关于墨子生卒年代的说法更多：

胡适认为，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公元前 500～公元前 490 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公元前 426～公元前 416 年）。

梁启超认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公元前 468～公元前 459 年），卒于周安王中叶（公元前 390～公元前 382 年）。

钱穆则根据墨子和公输般、楚鲁阳文子的关系以及《墨子》书中所记载的言行，考定墨子约生于公元前 479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394 年左右。

诸说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很大，前后不出 30 年左右。比较而言，钱穆的考证似乎更可靠一点。说墨子卒于公元前 394 年左右，有《墨子》一书的支持。《鲁问》篇记载说墨子曾和齐大王相问答。齐大王可以确切地断定为齐太公田和，田和执政从公元前 404 年开始，这说明墨子至迟于公元前 404 年尚在人世。《鲁问》篇还记载有鲁阳文君对墨子语：“郑人三世杀其君，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据考，郑人三世弑君，最后一位为郑繻公，被弑时间是

孙诒让：《墨子间诂》第 641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公元前 396 年。鲁阳文君和墨子的谈话发生在这件事之后三年，则为公元前 393 年。联系到墨子不及见吴起之死，可以相信，墨子的卒年一定在公元前 393 年到公元前 381 年之间。另一方面，把墨子的生年定在公元前 479 年前后，也能和止楚攻宋一事相印证。墨子一生行事以止楚攻宋为最著，按照钱穆的考证，止楚攻宋发生在公元前 445 年到公元前 440 年之间。这时墨子刚好处于壮年，因此才能既担当其学派领袖的重任，又能赢得“北方贤圣人”的美誉（据《渚宫旧事》记载，墨子献书惠王的时间为公元前 440 年，当时，鲁阳文子曾在惠王面前赞誉墨子为“北方贤圣人”）。

把墨子的生卒年代限定在公元前 479 至公元前 393 年之间，对战国人的一般寿命来说，似乎太长。但由于史料的限制，要想比这个推测更准确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 二、生平行事

墨子一生行事，史书中同样没有记载。根据《墨子》和其他一些秦汉旧籍，可以看出，墨子和先秦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主要从事的不外是讲学和游说两个方面的活动。

据说，墨子早年曾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吕氏春秋·当染》篇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意思是说墨子曾就学于史角的后人。由于春秋以前王官世守其职，史角的后人仍当操守史官之业。墨子从史角后人那里获得的也当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一点从墨子随口征引《诗》、《书》，并遍读百国《春秋》的事实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淮南子·要略训》又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可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意思是说墨子还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淮南子》这

种说法的根据不知何在，但从孔墨两家的主张处处相悖，如：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爱，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等等来看，若说墨子非常熟悉儒家或孔子的一套主张，当无问题。《庄子·天下》篇曾说墨子“好学而博”，再加上他又生在鲁国，易受浸染，所以在其早年，曾经学过孔子的东西并非不可能之事。《淮南子·主术训》说：“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正可说明两家思想有某种共同的起源。只是到了后来，当墨子发现儒学的繁琐和空洞根本无助于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才从儒学的影响中走出，开始自创学派，自立新说。

墨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授徒讲学，史无确载。合理的推测是，他成年之后不久即获得了教师的身份。因为，在止楚攻宋前后，他所开创的学派实力已经强大到一次可以出动三百人帮宋守城，他自己也已赢得了“北方贤圣人”的称号。由于弟子人数众多，教育任务繁重，讲学似乎成了墨子的主要职业。《贵义》篇云：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

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说明他既没有担任行政职务，又不需要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他自己如此看重读书，除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外，大概也是出于讲学的需要吧。

在墨子看来，教育是一桩“为义”的大事。如果一个人仅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耕作，其作用最多只能相当于一个农夫；仅靠自己去努力纺织，其作用最多只能相当于一个农妇；仅靠自己去

努力打仗，其作用也最多只能相当于一名士兵。一农之耕、一妇之织、一夫之战并不能解决天下之饥寒和战争。但是，教育就不同了。教育可以让天下人明白劳作的重要以及战争的危害，其作用远远大于自己去耕织：

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鲁问》）

正因为对教育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墨子才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从事教学活动。和儒家“恭己以待”的教学态度不同，墨子主张强学强教，有了“良道”，要“遍从人而说之”，使每一个人都能明白其好处。是否做到“有道相教”甚至是判定一个人是否为贤良之士的标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墨子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分科教学、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等等。这些经验和方法使墨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之一。

除了授徒讲学之外，墨子另一方面的活动便是在列国游说。墨子的游说大概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宣传自家的主张，以实际行动从事救世大业；另一个则是举荐弟子出仕，借以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他曾告诫弟子说：“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惠音湛涵，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鲁问》）这也可以看作是墨子游说列国时的一贯原则。

根据《墨子》五十三篇，墨子的足迹所至，除了鲁国之外，大概北有齐，西有卫，南则有楚、宋等国。据说，墨子还打算到更加遥远的越国去，只是由于担心越王不会采纳他的主张而未果。在

这些国家里，墨子和贵族、当政者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这使他能成功地推荐自己的弟子出仕。但另一方面，墨子并未找到愿意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明主。除了少数的几次外，墨子的游说活动大都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所以，作为政治实践家的墨子，远远不如作为思想家和教师的墨子来得重要。

从《墨子》本书的记载看，墨子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活动有如下几次：

1. 止鲁（鲁阳文君）攻郑。鲁阳文君是楚国的封君，与墨子相友善。一次，鲁阳文君准备攻打邻近的郑国。墨子听说后，急忙赶到鲁阳文君那里，以便制止他。墨子对鲁阳文君说：“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小都，大家攻伐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材，则何若？”鲁阳文君回答说，鲁四境之内均是他的臣民，如果大都攻小都、大家攻小家，他一定会严厉地惩罚他们。墨子则用类比的方法巧妙地指出鲁阳文君的错误：“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示不至乎？”最后，鲁阳文君终于被墨子所说服，放弃了攻郑的打算。

2. 止楚攻宋。止楚攻宋是墨子一生中最伟大、最成功之举。按照钱穆的考证，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45 年到公元前 440 年之间。当时，公输般替楚国建造了攻城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急忙忙从鲁国出发，走了十日十夜才赶到楚国的都城郢。他首先求见公输般，用一番攻国不义的道理驳得公输般哑口无言。然后，他们又一起面见楚王，重新阐释自己的立场。而当劝说失败了的时候，墨子和公输般又马上在楚王面前展开了一场实力的较量。墨子解下自己的革带作为城墙，以小木板作为防守的器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方法，墨子都成功地瓦解了他。到最后，公输般用完了攻城的器械，墨子的防守之道还绰绰有余。公输般无奈之余，想杀掉墨子以实现攻宋的目的。墨

子却告知对方，自己的三百名弟子已拿着防守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待楚国的进犯。在墨子的这种精神和实力的影响下，楚王只好取消了攻宋的计划。

和止鲁攻郑相比，止楚攻宋的意义更大。鲁阳文君只是楚国的封君，他和郑国的矛盾可能只属于边境的磨擦。楚宋则是两个实力悬殊的诸侯国，它们之间的战争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当楚国已经充分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时，墨子还能够凭机智和实力制止这场战争，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从战国诸子争相传述这件事，就足可看出它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3. 献书惠王。《贵义》篇云：“子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惠王以老辞。”余知古《渚宫旧事》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鲁阳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两书的记载大同小异，说的都是墨子的献书并未打动惠王之心。这当是墨子一系列不成功劝说活动中的一例。

4. 止齐攻鲁。《鲁问》篇记载说，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墨子劝说齐将项子牛道：攻打鲁国是齐国的大错。过去吴王夫差东伐越，西伐楚，北伐齐，以至于把四邻得罪光了，所以后来诸侯联合起来向吴国报仇。吴国的老百姓因为不堪其苦，所以都不愿为他效力，结果吴国灭亡了，吴王自己也遭到刑戮。紧接着，墨子又亲自面见齐国国君，迫使齐君承认并国覆军、戮杀百姓为不祥之举。不过，墨子的这些劝说似乎并未起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同一篇《鲁问》中又这样写道：“项子牛三侵鲁地。”

5. 与儒者辩论。鲁国是儒家的大本营，墨子由于长期居住在

鲁国，所以双方难免会发生相互冲突之事。《公孟》、《耕柱》等篇记载了墨子和儒者巫马子、子夏之徒、公孟子等人的辩论，讨论的内容涉及面极广，如礼乐、言服、述作、丧葬及兼爱等等。这些辩论一方面显示出儒墨相争的程度之激烈，一方面也有助于扩大各自的影响。

墨子个人的生平行事大体如此。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还需简单谈一下墨子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墨子是个个人品德最高尚的少数人物之一。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学派领袖，墨子具有丰厚的同情心，他对民众的疾苦极度关心，以至于为天下兴利除弊成了自己毕生奔走的目标。他的信念之坚几乎无人能比。即使在最失意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念。所以，当他的一位故人以“天下莫为义”为由劝他不如算了时，他却反问道：“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贵义》）正是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墨子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荣誉。历史上，批评他的学说的人很多，但怀疑墨子人格者尚不多见。《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正可代表大多数论者的意见。而《淮南子·修务训》则干脆把孔墨并称为替天下兴利除害的大圣人：“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这恐怕是后人所给墨子最高、最公正的评价了。

### 第三节 墨家学派的形成与分化

由于墨子的人格高尚，主张深得人心，所以在他的周围很快